

《古今艺文》，第 25 卷第 1 期，1998 年 11 月 1 日出版，台湾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一页

-- 来华西方传教士学术成就琐议

冯志伟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北京 朝内南小街 51 号

100010 北京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叶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部分是很有学问的学者，他们在传教活动之余，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是学者型的传教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是在欧洲早期殖民国家努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派遣他们的国家和罗马教廷，都把他們当做建立和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不同时期来中国的传教士，在传教活动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上，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本文拟对不同时期这些传教士对传教活动与学术研究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从 1552 年到 1687 年，基本上是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教士活动为主，在这个时期，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文化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他们的目的。意大利传教士 Matteo Ricci (利玛窦, 1552-1610) 之所以研究中国的文化，传授西方学术，首先是为了结交中国的文人和官员，乃至皇帝，借以在中国站住脚跟，进一步打入上层，进入宫廷，最后争取中国皇帝皈依天主教。Matteo Ricci (利玛窦) 以为，一旦皇帝成了天主教徒，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就不会受到干扰和限制，他们就可以把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这样，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了。由于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天主教的教义相差较大，要在中国人当中传播福音，使他们相信天主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Matteo Ricci (利玛窦) 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努力在天主教教义和儒教之间找到尽可能多的共同点。以此来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相信天主教和中国本土固有的文化之间同根同源。所以，在这个时期，尽管 Matteo Ricci (利玛窦) 等也是学者型的传教士，但是他们的研究学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正如 Matteo Ricci (利玛窦) 本人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所透露出来的：“但是人们不应该认为他们（按：指西方传教士）隐瞒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就是要传播福音”。德国传教士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1592-1666) 也是学者型的传教士，《主制群微》一书的“序”中说：“利玛窦卒后，名业与利玛窦相并，堪称为耶稣会之二雄者，若望也”。他在服务中国宫廷、研究天文、修制历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得清朝顺治皇帝得喜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钦天监正的外国人，而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给顺治皇帝修历的真正目的，是想以此敲开皇家的大门，争取顺治皇帝皈依天主教，但是，顺治皇帝却公开向汤若望表示：“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经一执中之理。西洋之书，天主之理，朕素未阅览，焉能知其说哉？”可见，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并没有达到他的真正目的。

著名比利时传教士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1623-1688) 精于天文学，曾著有《坤

輿图说》、《新制灵台仪象志》、《康熙永年历法》等书，他深通中文，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位学者型的西方传教士。顺治皇帝任命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为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的副手在钦天监任职，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去世后，他向康熙皇帝提出修改历法，取消 1669 年的闰十二月，得到康熙皇帝的赞同，从此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的威望大增。1670 年为顺治皇帝修孝陵时，须要把修陵用的巨石运过卢沟桥，他提出用绞盘牵引的办法，使巨石顺利通过了卢沟桥。他还为清政府造火炮，康熙皇帝亲自点炮试射，甚为满意。他还为康熙皇帝讲几何学和天文学，陪同康熙皇帝出巡。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从事这些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教。但是，中国教区的传教活动到了 17 世纪末叶日渐冷落，使在清朝宫廷中备受重用的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坐立不安。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晚年在病重的时候，已经关切地看到了中国教区的冷落的这种局面，为了加强传教活动，他向西欧发出呼吁，要求增加派遣传教士来中国。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的呼吁引起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重视。1685 年 3 月 3 日，路易十四经过精心挑选，派了 6 名有“皇家数学家”之称的学者型传教士往中国，临行前他们受到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接见，这 6 名传教士中，除 1 名中途留在暹罗（今天的泰国）传教之外，其余 5 名都于 1687 年到达浙江宁波，他们在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去世十天之后进入北京，于 1688 年 3 月，拜见了清朝的康熙皇帝。他们的名字分别是：Jean de Fontaney (洪若翰，1643-1761)，J. Fr. Gerbillon (张诚，1654-1707)，Joachim Bouvet (白晋，1656-1730)，L. D. Le Comte (李明，1655-1729)，C. de Visderou (刘应，1656-1730)。临行前，路易十四召见 Jean de Fontaney (洪若翰) 时说：“我的神父，那些科学不值得你去承受远涉重洋之苦，不值得你去违背自己的意愿，远离你的祖国和朋友。但是，我也希望，在你们布讲福音不很忙的时候，能在当地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去观察那些完美的艺术和科学，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法国财政总监 Colbe (科尔贝) 在向 Jean de Fontaney (洪若翰) 交待来中国的任务时也说：“希望你们珍惜这种机会，宣传教义之余，随时随地做些必要的考察和探索，使科学和艺术臻于完美。”可见，不论是路易十四和科尔贝，都明确地把科学考察作为传教士的一项任务，从此之后，这些学者型传教士的工作，与他们的先行者略有不同，传教固然依旧是他们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和首要使命，然而，他们同时也是明确地带着科学考察和文化交流的任务来中国的。对于他们来说，科学考察和文化交流既是传播天主教的手段，同时也是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之一。

不过，无论传教士们是否把科学考察和文化交流作为目的，他们都程度不同地把科学和文化当做“敲门砖”，借以取得中国人的信任，进而向中国人传播天主教。

这些学者型的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他们的学识得到了清政府的尊重，他们受到的待遇也与那些西方商人大不一样，西方商人被中国的清政府称为“夷”，也就是“野蛮人”(savage person) 的意思。而这些学者型的传教士则被尊为“师长”(teacher)。继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之后，Joachim Bouvet (白晋) 和 J. Fr. Gerbillon (张诚) 都作过康熙皇帝的老师，教康熙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由于他们的学识渊博，深得康熙的器重，于是康熙皇帝让 Joachim Bouvet (白晋) 回法国招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1697 年，Joachim Bouvet (白晋) 回法国又招了 10 名传教士来中国。他们当中有几位是颇有造诣的学者。如 Joseph Marie de Premare (马若瑟，1666-1736)，Jean Baptiste Regis (雷孝恩，1663-1738)，Dominique Parremin (巴多明，1665-1741)，Antoine Gaubil (宋君荣，1689-1759)，De Maillac (冯秉正，1669-1748) 等。这些传教士一面进行传教活动，一面也作学术上的探索。他们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来中国之后，又学习了汉学方面的

知识，因此他们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Antoine Gaubil（宋君荣）来中国之前，就在神学、哲学、天文、地理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法国许多一流科学机构的成员，在中国住了 36 年后，研究中国文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古代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研究中，都卓有成就，著作达 80 多部，有“耶稣会士中最博学者”之美誉，他于 1747 年被聘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后来又被聘为巴黎科学院通讯院士。Jean de Fontaney（洪若翰）于 1699 年回法国时被聘为法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De Maillac（冯秉正）的《中国通史》(Histoir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ere) 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历史专著，其史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得到学者们很高的评价，成为欧洲中国通史的“楷模”。

西方传教士的学术成就，从《耶稣会士通讯集》(Letters Edifiant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关于中华帝国及满蒙地理、历史、年代、物产的描述)、《中国丛刊》(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g, 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备忘录)等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耶稣会士通讯录》，从 1702 年刊出，到 1776 年，共出了 36 卷，第 16 至 26 卷，记载了传教士们从中国寄到西方的通信，为欧洲读者提供了有关教区的生活的情况，并介绍了有关中国的各种新鲜事物。

《中华帝国全志》于 1735 年在法国巴黎出版，是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百科全书。共四卷。第一卷记述了中国的地理以及从夏代至清朝的历史大事记。第二卷记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介绍了中国的经书、教育和科举制度。第三卷记述了中国的宗教、道德、医药、博物情况。第四卷研究了中国的满蒙等少数民族的情况，并涉及西藏和朝鲜的一些资料。

《中国丛刊》，从 1776 年刊出，到 1814 年，共出了 16 册。收集了各家各派对中国的论述，是一部大型的论文集。《中国丛刊》还登载了《大学》《中庸》的法文译本，《本草纲目》的译文以及园林诗。《中国丛刊》是重要的学术著作。

这些著作涉及的学科，除了历史、地理、宗教、道德、政治、艺术之外，还涉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基础学科以及园艺、农业、城市建筑、军事、瓷器、煅烧、化工、漆器、冶金、音乐、造纸、度量衡、纺织、运输等技术学科。

西方传教士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还作了很多实际的工作。《中华新图》的绘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由 J. Fr. Gerbillon（张诚）乘中俄尼布楚谈判之际，把自己绘好的亚洲地图进呈康熙皇帝，并指出中国东北部分因资料缺乏，无法绘制，建议康熙皇帝组织全国大地测量，后来 Dominique Parremin（巴多明）查阅各省地图，指出不少城镇的位置与实际不相符合，促使康熙皇帝下决心绘制全国地图，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地测量工作开始进行。1708 年，这项规模巨大的大地测量工作由 Dominique Parremin 和 Jean Baptiste Regie（雷孝恩）主持，参加者还有 Joachim Bouvet（白晋）和 Guillaume Bonjour（1670-1714，潘如），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于 1716 年完成了大地测量工作，并于 1717 年绘成地图，献给康熙皇帝，康熙赐以该地图以《皇舆全览图》的称号。大地测量工作非常艰苦，法国传教士 Guillaume Bonjour（潘如）在云南测量时，因劳累过度，为瘴气所袭，以身殉职。

上面所讨论的都是耶稣会士在传播教义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成绩。耶稣会士对于文

化和科学交流的自觉性最高，贡献也最大。

186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上海出版了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一书，对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作了介绍。他说，在1807-1842年之间，新教传教士出版了100多本汉语书籍，至19世纪50年代末，至少出版了266本，其中253本是用官话写的，其余是用南方方言写的。到1867年，已经出版了777本新教徒的著作，其中187本是用方言写的。德国传教士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郭实腊, 1803-1851) 出版论著61种，英国传教士 Walter Henry Medhurst (麦都思, 1796-1857) 出版论著59种，英国传教士 William Milne (米怜, 1785-1822) 出版论著21种。到1867年为止，在已经出版的777种著作中，有474种是宣扬宗教的书籍，它们是圣经、教义问答录、道德箴言录、神学论文集的各种摘录本。1854年以后，又出版了100本不以宗教为题的著作。这样鸿富的著作的出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传教士的学术成就。

当然，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要目的还是传教。在传教活动中，他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西方传教士很重视对中国皇帝宣传天主教的教义。Matteo Ricci (利玛窦)曾经把一幅绘有西方盛装的王公贵族又绘有天使和教皇的宗教画，送给明朝的万历皇帝，他在画上还加了简单的文字说明，试图让万历皇帝理解画的含义，引发万历皇帝对于天主教的兴趣。可是 Matteo Ricci (利玛窦)的努力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万历皇帝除了请 Matteo Ricci (利玛窦) 指导宫廷画师临摹了这幅画之外，对于画中的天使、教皇等，只字未提。Matteo Ricci (利玛窦)抓住一切机会向万历皇帝宣传天主教的教义，结果一无所获。

前面说过，Johann Adam Schall von Adam (汤若望)也试图争取清朝的顺治皇帝皈依天主教，可是也没有达到目的。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与康熙皇帝相处甚洽。他于1682年陪同康熙到东北巡视，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后来在他的《鞑靼旅行记》中回忆说：“皇帝对我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好感。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同他信赖的密友一样，盼我不离开他的身边”。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Joachim Bouvet (白晋)和 J. Fr. Gerbillon (张诚)都当过康熙皇帝的老师。他们都抓紧各种机会向康熙皇帝宣传天主教的教义，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Joachim Bouvet (白晋)在《康熙皇帝》一书中说过：“这位皇帝非常尊重天主教，而且喜欢倾听我们讲解教义”。康熙曾经为北京的一所教堂亲自题“万有真原”的匾额。1711年，康熙还为北京的宣武门内天主堂题律诗一首：“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可见康熙皇帝对于天主教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似乎还有了认同的迹象。当然，从政策上来看，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活动是限制的。1669年，康熙皇帝传谕：“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可见，除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等少数传教士外，地方上的传教活动是被明文禁止的。

1692年，由康熙本人授意，礼部尚书等议奏：“西洋人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康熙立即同意了 this “议奏”。这样，传教士在中国就可以自由传教了。可以说，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等传教士对康

熙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努力，在 1692 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传教活动进入了黄金时代。

可是，1705 年教皇派使节 Dorro（多罗）来中国，要求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尊孔和祭祖，引起了“礼仪问题”的争论。康熙皇帝对于 Dorro（多罗）的要求极为反感。康熙对中国教民尊孔祭祖的解释是：“中国供牌一事，并非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尔们画父母之像以存不忘之意同也。”康熙支持中国教民尊孔祭祖，而教皇使节禁止中国教民尊孔祭祖，由于教廷使节与康熙在“礼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激怒了康熙皇帝，于是，康熙下令，凡在中国的传教士均须领“票”，表明永不回西洋，才允许在中国居住，否则解送出境。传教士的活动因而受到限制。1720-1721 年之际，教皇使节来中国递呈教皇对中国教民的禁约之后，康熙愤怒之下，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这样，康熙皇帝便走向了禁止天主教传教的道路。

由此可见，耶稣会士们在传教方面，真是阻力重重。至于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由于他们反对中国教民尊孔祭祖，传教活动更是难于进行了。

要传教就要翻译《圣经》。传教士在《圣经》的翻译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早的中文《圣经》译本是英国传教士 Robert Morrison（马礼逊，1782-1834）翻译的，1823 年，在英国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资助下于麻六甲出版，叫做《神天圣书》。其实，英国传教士 Joshua Marshman 早在 1822 年，就在印度的 Serampore 教区出版了 The Bible 的中文译本，书名就叫做《圣经》，可惜这个译本很可能没有流传到中国的本土。后来，中国至少出现过两个《圣经》的中文译本。一本是在 1835 年刊行的《新约》，由英国传教士 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Elijah Coleman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John Robert Morrison（马儒汉，马礼逊之子，1814-1843）和德国传教士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郭实腊）联合翻译；另一本是 1838 年刊行的《旧约》。最好的译本是所谓“委办译本”，即 1838 年出版的《新约》和 1854 年出版的《旧约》，均在上海出版，也是由西方传教士翻译的。

传教士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福音书传遍中华大地。在 Alexander Wylie（伟烈亚力）的 Memorials of Protestan Missionaries 中，介绍了新教的传教工作。他说：“在当时有两个特别活跃的广州教徒（梁阿发和 Kew Agang），在中国内地巡回 250 英里，向他们的同胞传播基督知识，散发他们自己编印的小册子。在赴西南方的途中，他们加入了一位科举考官的随从行列，因此，他们沿途可以毫无阻拦地和年轻文人接触，他们向这些文人散发了七千多本内容十分重要的小册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教活动对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影响。大约在 1833 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有一个叫做洪仁坤的人，他有一本梁阿发的宗教小册子《劝世良言》的复制本。他考试未中，后来自称为洪秀全，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据说，洪秀全开始对于宗教著作并没有多少兴趣，但是在 1843 年当他重读宗教著作时，就坚定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是耶稣的弟弟，受天之托，前来拯救盛行偶像崇拜的中国。1847 年，洪秀全连续两个星期，去英国传教士 Issachar Jacob Roberts（罗孝全，1802-1871）那里听课，在 Issachar Jacob Roberts（罗孝全）处，他第一次看到了《圣经》的中文译本。洪秀全把他建立的国家叫做“太平天国”，其中“天国”二字，就是取自福音书中马太所指的“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s）。当时，《圣经》译本中的“福音书”（the Gospel）、“甜露”（biblical manna）、“安息日”（the Sabbath）等词语，在太平军中广为传播，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才消声匿迹。

总的说来，尽管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教义，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就似乎并不在传教方面，传教士们以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把西方的学术和东方的文化结合起来，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比他们在传教上的成就还要大得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学术研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加强了“东学西渐”的进程，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American Prebyterian Mission, Shanghai 1867. 重印本：成文出版社，台北，1967年。
2.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6*, 1993, Berkeley, U.S.A.
3. H Bernard, *Ferdinand Verbiest, continuateur de l'oeuvre scientifique d'Adam Schall*, *Monumenta Serica* (《华裔学志》), 1940.
4. H Bosman, *Ferdinand Verbiest,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ekin*, *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 IVe, Serie T. XXI.
5. 南怀仁，鞞鞞旅行记，《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
6. 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哈尔滨。
7.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北京。